

1104



# 海 寧 文 史 資 料

第 63 期

政协海宁市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 拔 财 神

——记解放初发生在斜桥镇的一起土匪绑票案

马煜芳

一九四九年五月，海宁解放，人民沉浸在一片欢乐之中，到处能听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的歌声。党和人民政府，为了建立新的秩序，发动群众，适时开展了反霸和剿匪的斗争。然而，流窜在郭店、斜桥、周王庙一带农村的张关荣一帮土匪（张关荣系浙江省民众自卫纵队第一支队大队长）拒不向我人民政府缴械投降，而是苟延残喘，继续与人民为敌。他们抢劫、绑票、杀害村干部，无恶不作。是年秋天，在斜桥镇我亲自经历了一次张关荣土匪绑票（俗称“拔财神”）事件。

我在一九四七年十四岁时，经人介绍，到了斜桥镇昌大新（简称“朱昌大”）粮面号学生意。朱昌大工商兼营，有店铺、碾米、发电厂等企业，其规模和经济实力，在斜桥镇上是数一数二的。老板是朱文彪、朱文廉俩兄弟。解放那年，我学徒没有满师，故常要负责看守店铺，晚上也不例外。这年深秋的一个晚上，天空下着小雨，稍有点寒冷，斜桥镇街道上，几乎没有行人，显得格外宁静。但是坐落在中街的显圣庵里却灯火辉煌，这里正在做戏文。我与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老年职工朱梓堂（老板堂叔），没有到戏文场去轧闹猛，而是留守在一间有办公桌、电话机的店堂里，两人看看报，聊聊天，以此消磨时间。约莫九点来钟，门突然一响，有两个穿深色制服的男子闯了进来，说“借打个电话”，我站起身来一照面，根本不认识他们，就婉言谢绝道：“对勿起，打电话请到褚泰丰去打。”（解放初斜桥电话业务仍由褚泰丰百货店经营）。我话音刚落，这两位不速之客就冲进店堂后面的小间。我感到他们有点不讲道理，便紧跟着进去想阻止，这时见他们中一人强行拿住挂墙壁上的电话机听筒，用双手把它放到膝盖骨上猛地用力一折，“格”的一声，顿时听筒断成两截。我一时不知其意（后来才知道，他们作贼心

虚,此举是想切断我们与外界的电话联系),急忙走出小间,没走几步,他们就从怀里掏出黑洞洞的手枪,分别对准我与老职工,喝令:“举起手来,不许动!”我们更被弄糊涂了,只好老老实实举手站着,心想他们可能是来抢劫店铺的。这时,我看见又窜进几个人来,轻手轻脚隐蔽在黑暗处,把守着通向里外的几扇门,东张西望,鬼鬼祟祟。挂在墙上的时鸣钟在“滴答、滴答”地响着,店堂里象死一样沉寂。稍过了几分钟,店堂东北角楼梯间忽然“噚、噚、噚”地响了起来,是有人正从楼梯上下来,他们这些人慌乱地动了一下,除了看住我们的两人之外,其他人仍隐蔽在黑暗之中,楼上下下来的人一点出没察觉情况异常,径直向我处走来,大概有什么事情要交代。来者就是朱昌大负责跑外勤的职员王张庆。这晚他衣冠楚楚,风度翩翩,身穿浅黑色上等全毛花呢哔叽短装(他年龄、个子、穿着与老板兄弟俩有点相似)。当他踏上我们所在店堂的门槛时,枪口从对准我们一老一少转而对准了他。他知道情况不妙,急速往我身边一靠,乘灯光暗淡,右手撞我一下,塞给我一个硬梆梆的小纸包。刹那间,隐蔽在黑暗处的也过来,左右两面把王张庆牢牢挟住,最后面一个用枪口顶住他的背部,只听他们凶狠狠地说:“跟我们走,快、快!”我与老职工看着他们把人绑架出门,消失在茫茫的黑夜之中。

事情发生后,我与老职工呆若木鸡,一时不知所措。老职工轻声对我说:这是“拔财神”。人被弄走,电话机被破坏,怎么办?老板还在楼上办公室,全然不知。停了一会,我看看店堂里再没有其他人了,把中间通向外面的门闩上后,才上楼去语无伦次地把刚才发生的事情向老板报告,并把王张庆塞给我的小纸包交给老板。老板听后十分震惊。连忙在办公室打电话向区人民政府报告,区里很重视,很快派了武装人员到店里来了解情况,问我“有多少人?往哪个方向去?”因为我当时很紧张,那敢外出跟踪,所以支支吾吾,说不清楚。武装同志即刻外出追了一阵,不见踪影。

“拔财神”的消息很快传开,一时成了斜桥镇上的重要新闻,人们谈论的主要话题。后来我得知,这是张关荣土匪部队所为。据分析,土匪原想绑票的是老板兄弟俩中的一个,绑票后作为人质,以索取一笔钱财。但是慌忙中弄错了人。王张庆这天晚上是在楼上同老板商量准备明天去上海联系业务等有关事宜的,

因当时货币还不稳定，所以老板给了他一点金器，包在小纸包里，以备到上海后派用场，想不到人被绑票，而金器又回到了老板手中。大家说，算王张庆晦气。我想，当时如果楼上没有人下来，我也许成了土匪绑票的对象。

土匪绑错了人，会不会再来绑过，大家尤其是老板们是心有余悸的。区人民政府为了寻机剿灭这帮土匪，一面关照老板们倍加小心，能避暂时避一避，一面又派了武装队的两位同志，我记得一位是区大队长刘洪德（山东南下干部，后任县公安局长），一位叫郎宪坤（斜桥人），晚上到我们店铺楼上驻守，准备来个守株待兔。他们与我同住一间宿舍，全副武装，子弹上膛，手榴弹打开后面的木盖，露出引火线。他们对我说：“如果他们（指土匪）来敲门，你尽管去开，不要怕，我们自有办法对付。”他们一连住了几天，不见动静，就离开了。从绑票第二天起，我与老职工俞介山早晨开店门时，几次在地上捡到恐吓信，内容是要店里老板在什么地点交多少多少钱财后，才能放回被绑票的人质。自己店里职工被绑票，老板心急如焚，时刻担心着他的安全，除了告诉他在农村的妻子外，还要想办法如何把职工营救出来。

时间在渐渐地过去，人们对绑票事件正在淡忘，我们仍然不知道王张庆被藏在何处，盼望他能早日归来。约莫过了半个多月，一天中午，天气晴朗（这时农村正在收割中稻），我有事路过斜桥中石桥，在桥头突然遇见了王张庆，我惊喜交加，叫了他一声。看他穿着一身破烂土布衣裳，完全象个贫穷的农民，问他：“怎么回来的？”他轻轻地说：“回到店里再说。”后来，他向我们讲了逃跑回来的全过程。大意是：这时张关荣的土匪部队已如惊弓之鸟，处境困难，绑架他到农村以后，东藏西躲，怕被追捕，经常变换地方，今天在这里，明天又转移到那里。对他这个人质视作生财之道，严加看管，晚上有人陪着睡觉，曾几次威胁要“毙掉”他。而他在土匪控制下，度日如年，曾几次想逃跑。一天，他们住在一家农民家里，机会终于来了。天刚亮，农妇起来梳洗，他看看站岗与陪睡的土匪正在熟睡，便假装起来小便而逃跑了。为怕土匪追赶，途中他把穿的毛哔叽服装与正在田间打稻的农民不计代价换了一套破旧的土布衣衫，装扮成在田间务农的农民模样，才曲曲折折地返回斜桥。

随着反霸、剿匪斗争和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张关荣土匪残部土崩瓦解，最后没有逃脱覆灭的下场。张关荣这个匪首逃往上海隐居，在镇反高潮中被我公安机关抓获。一天，武装人员押着他在斜桥街上走过，看的人都说：“这是张关荣”，我跟着大家到店门口看了一眼。一九五〇年四月张关荣在县里被公判处决。

（注：王张庆同志是斜桥米厂退休职工，现居住在丁桥镇农村老家。）

## 李壬叔先生轶事

吴汉明

李壬叔先生，讳善兰，字秋纫，初名心兰，壬叔是他晚年的号，海宁硖石镇人，生于1811年1月2日子时，卒于1882年12月9日子时，是我国近代著名数学家和天文学家。曾为我国乃至世界历算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笔者幼年常听先父慎藩公讲述先生的故事和有关见闻，现略述几点于后，聊表钦仰之情。

### 一、晴天出门 雨伞钉鞋

先生年轻时钻研天文历象，并已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故能熟练地预测气象的变化和规律，但其邻居开始时不很了解他，有时见他上午出门时明明是大好晴天，却见先生拿着雨伞、钉鞋（旧时雨鞋），当时有人觉得奇怪，但到晚上回来时果真下雨，只见先生手撑雨伞、脚穿钉鞋而归，连续多次，邻居们才知道壬叔先生原来是一位懂天文的行家。

### 二、露宿屋顶 夜观历象

为了专心研究星象知识，先生每天要到硖石东山顶上去实地观察，连洞房花烛之夜也不例外。他在结婚这天夜里，虽未上山，却只身离房登上阁楼窗口去观察星象，一时间闹了个洞房花烛之夜新郎“失踪”的笑话，这个故事在近一百多年来的硖石乡邦一直传为美谈。还有一件趣事，有年夏天，先生为了观察星

象，就干脆爬上屋顶露宿，直到天明才下屋，当时邻居听到屋上有人，疑是“宵小”，便大喊“捉贼！”但见下屋的却是李先生，方才解除了这个误会。

### 三、诗存刊行 历经百年

先生博学多才，著述宏富，尤精历算，所著《则古昔斋丛书》早已镂版刊行，名布中外，近闻日本等国研究其学术者已盛极一时，然先生之宏著，历算以外，兼有词章，其遗诗久未刊行问世或近湮没。《听雪轩诗存》是反映先生青壮年时期思想和生活的可贵资料。先生无子，歿后其稿由其外甥崔敬昌收藏，崔于1917年由沪挈眷居硖，载先生遗书俱归，詎料1926年硖石大火，殃及崔宅，以致所藏俱毁。幸1899年前后，经蒋子贞、朱昌燕、吴昌年（笔者族伯）三位学者先后搜罗先生遗诗，汇编成三卷诗稿，后由硖石紫来阁藏书楼徐光济收藏，欲刊未行。到1933年，崔敬昌之子崔李同获悉徐氏藏有《听雪轩诗存》，随即喜倩先父慎藩公代为作跋于后，但当时崔李同限于经济条件，亦未能刊行此书，仅由蒋铨又先生抄录副本。1950年，张惠衣先生致函先父，转告张宗祥先生询及先生遗诗，欲留藏浙江图书馆，以垂不朽；因而由先父向蒋铨又先生借寄杭州，俟张宗祥先生获取全抄，原稿还归蒋氏。直到1991年海宁市政协文史委以浙江图书馆和北京图书馆两处藏本校正后正式刊行问世，距先生之歿，已历一百十周年有余。

### 四、先生遗像 湮而未没

先生歿后，各方人士求搜其遗像者，多年不可得，1933年，先父在代崔李同撰文《听雪轩诗存跋》一文中言及“沪滨海昌公所有存（壬叔遗像）”，于是崔李同遂即摄而置之卷首。但因久不刊行，社会上未见流传。1951年春，浙江省文物保管委员会张惠衣世叔为编辑《浙江近代学人像传》，搜访先生遗像颇费时日，幸瑞安孙仲容（诒让）先生曾有所藏，因而将此小照翻拍编入，并赠先父一帧，先父得照后，又翻拍放大收藏，每年列为神主供奉。再在照的背面题诗七律一首并序，该诗还蒙上海儒释名家姚明辉（孟坝）法师审正：

数列周官六艺名，道通一贯万归明；

重句测海幽微术，寸木量天法度精。

盖笠覆查观历象，范金走水审阴晴；

薪传定九千秋业，则古丛书孰与京。

1959年，上海某单位拟举办纪念先生的活动，缺少遗像，无奈凭印象画照，屡画不像，此事被先父学兄胡振凡闻悉，胡即来向笔者索取，转送上海翻印后原照留存海宁文化馆珍藏。

（编者按：前些年本市搜求地方文献时，曾从清末出版的《格致汇编》原书上得到另一幅16开大小的精印李善兰先生晚年肖像。）

## 李善兰与刘鹗等人关系

高健行

国家主席江泽民把世纪宝鼎送给联合国，这实在太有意义了。鼎这个东西是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民族都没有的中华精神之具象。它包涵的文明讯息量很多。难怪近来海外报章掀起一股谈鼎热浪。有的报纸竟辟了“谈鼎”专栏。不由令人想起我们的前贤先哲、中国现代科学的奠基者之一，海宁李善兰（1811—1882年），他与钟鼎学、考古学有些关系。这一点似乎自然科学史学家们从未提到过的。笔者知此，主要因为研究《老残游记》及其作者刘鹗（1857—1909年），从资料中获悉的。近于整理家先祖生录公（1884—1950年）遗稿时，从故纸堆中觅得一页《周无专鼎铭九十四字》（附后），纸不过尺幅，摹临移录铭文九十四字于中间。每字约半寸径，旁均注行楷小字。接着有八行小楷以为款志。最右边标题后另有两行，显见是生录公当年抄录时的附题。这幅小小尺余鼎文及款志，却给我们后世留下了不少文献讯息。虽作用无法与世纪宝鼎同日而语，但也很有它的珍贵意义。

此抄件录于“民国廿三年秋仲”，即1934年。从什么地方抄来并不标明，但读一下款志，便见赫然写着：“李善兰精推步之学，据铭中所谓九月既望甲戌之文推之，此鼎必作于周宣王之十六年。”明确表示原文作者得益于精推步之学的李善兰。下文则简述此鼎几何尺寸及蟠饰夔纹，又略提一下传世掌故。从最后一行

款志可见是这样写着：“鶚于癸酉冬日在焦山曾见之，暗然浑古。曲阜张润甫明府自京江取得拓本见贻，即摹刻之。”这位自署名“鶚”的人是谁呢，其实便是精通中华国粹文化的刘鶚，刘鶚一生著作多，笔名斋名也多。然而，这个鶚字倒是他的原名——孟鶚或者梦鶚，连其在家中乳名也唤作鶚鶚。焦山即是他家乡府治镇江的名胜地。癸酉那年，即同治十二年（1873），是十七岁。虽则他父亲出官河南，他也随侍任所。也正是这一年他娶妻王氏。婚嫁礼仪或其他事由，势必有机会返乡。途出镇江焦山一游，亦情理中事。应该说，款志文字中明确以李善兰攻究考据铭文，推算铸鼎年代，是很有道理的。这是因为非但李善兰早就是闻名京沪乃至中外学界，为“天算”、“地学”等诸多学科的现代自然科学先驱，任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同文馆“天文算学总教习”，官拜三品衔。而刘鶚也是学术奇才，几度被保荐咨送总理衙门考试。保案中称：“该员向习算学、河工、兼谙机器、船械、水学、力学、电学等事……”也曾著有《勾股天玄草》、《弧角三术》二卷等数学专著。李善兰从年龄和学术成就看，自是刘鶚的学长师尊辈。刘鶚当曾有所请益过从，起码也应熟谙李善兰学问著述。即使至光绪年间，于1887年刘鶚到上海创办石仓书局，他在《石仓书局广告》中，把“李撰九章算术细草图说”也开列在内。于1887年9月29日《申报》上还特地为之刊登《石印九数通考启》，再后一个月的26号《申报》的广告中申明：“以上三种均同文书局石印，划归本局发售，购顾者售从廉。”这表明刘鶚的石仓书局与上海老字号同文书局有一层“联营”性质。资信势必相应。正是这个同文书局，传统经营彼时最“现代化”科技著作和翻译书刊，包括李善兰参与西士编刊的《格致汇编》及小仓山房印本《天文学》等李著种种。也有如英国傅兰雅口译，徐寿笔述的《铁船针向》《机动图说》等书籍，这一年距李善兰逝世才五年，学术上的彼此影响力尚未消失。总之，这之前，尤其是五年以前，刘鶚于考据文物年代，请李善兰指点或依其算法定理推论，都是十分自然的事。从而可以看出刘鶚这位同时代稍早些的学长李善兰，与他总有着学术上的关联。这就不单对充实李氏故乡海宁的乡邦文献有作用，并且对中国现代科学史研究，也是项有用的线索。此点倒是当年款志作书始料未及的。

再说，生录公在题志附笔中注明：“于仲鼎每多不识，近年偶有笔订，感荷李



君叔冰。李又谢世……”可见只是从某刊印本抄录的。唯究竟录自那种刊本书报未详。不过众所周知，刘鹗生平好收藏碑贴、文物。1902年，刘鹗挚友、有正书局老板狄楚青（即开设于上海望平街的平等阁主人狄葆贤）向刘鹗借用不下百部藏贴碑拓，精印出版。也许这件《周无专鼎铭》便在其间，流布于世。所以反复阅读这则1934年移录题跋，无论从时间、空间、人际关系和行文习惯来看，特别是在写到此鼎流传故事时，称“吾乡魏氏”，更可佐证那位署名“鹏”的人物，即是同邑刘鹗——那个时代，即癸酉前后，彼地收藏家中，堪以文字相交于三品大员李善兰，以及有资格与尊称“明府”（古时于太守牧令皆称明府君或府君，简称明府。唐诗中亦多称县令为明府）的张润甫者交往，别无他人，只能是刘鹗。

当然，如能找到原刊物，查实原拓原跋那就更理想了。这在实际上也并非没有可能，线索还是存在的。例如刘鹗集外文字中有一则刊布于1904年7月10日的《时报》，名为《三代文字》，性质上近乎广告。但言词简明，说有《藏龟》、《藏陶》、《藏货》、《藏珍》四部出版。后来前两者确付梓推出。其《藏货》稿似于八十年代中华书局出版过（笔者也在苏州书店见到）；而《藏珍》据说尚存上海图书馆，有条件时可去借阅一下，极有可能找出原稿原拓影印本或者摹刻本。又想，生录公既然抄录，大概三十年代已有拓品在报刊上布露，则希碑帖书家指教了。

附带还有几点发现，也是很值得充实我们海宁乡邦文献的。首先，先祖《小志》中明言：“民国廿三年秋仲”“李君叔冰，李又谢世”云云。可见1934年前李已谢世，故《海宁艺苑人物》中所记卒年1937年，明显有误。此外，笔者在采集史料时，又发现一些李善兰的事迹。正因为这位乡先贤留存后世的资料特少，所以尤觉可贵，那是金石名家陈巨来介弟陈左高先生庋藏的《蘅华馆日记》未刊孤本的记载，是报界前辈王韬的著述（王字仲弢，号紫铨，江苏长洲人，别署天南通叟）。英人理雅谷尝聘请他去伦敦翻译中国经书，便又署名“欧西经师”，也游学过日本。居住上海时间很长，曾主讲格致书院，兼任《申报》编辑，即署名淞北逸民）。他与同时代也常与西士合译洋书的李善兰友善。现在存世孤本中有王氏咸丰八年冬至十年夏的日记。其中有载：“十二月三日甲辰，天晴而颇有寒意。薄暮，孙次公来泊舟洋泾桥畔，特来告别。乃同小异、壬叔，往黄公炉侧小饮三爵。夜，小

异饭于余舍，村酿甚甘，堪以御冷。”“六日丁未，清晨入城，遇阇斋于途，约作消寒会。偶过酒炉，见有蛤蜊甚巨，因沽酒独酌。午后，小异、吉父、春甫俱集，同阇斋登鸿顺楼大嚼，酒倾数壶。顷之，壬叔亦来，洗盏更酌。酒兴勃发。”可以看到李壬叔（善兰）好酒的习惯，以及彼时的好友们情趣。并且也可看出，上海浦东洋泾镇彼时已为西学士人游冶之地，现今则是开发区了，岂非有些历史因缘。同样凑巧的是，笔者几乎同，从乡邦文献故纸堆中发现刘鹗的一点轶文。前文已提及，刘氏生平爱好收藏碑贴、文物。1902年，有正书局老板狄楚青向刘借用不下百部藏贴碑拓，精印出版。每件藏品都有刘鹗题跋或考订。这次笔者寻得的即是刘氏为《精拓太清楼书谱》所作的介绍。文字十分简约：“安刻乃宋人抚写本，非原本也。此本与薛本端为双璧。抱残守缺斋（按刘鹗斋名）得此二本合为一函，后附释文。注中考据极详。日本前时曾翻刻薛本而不全，每笑安刻之失真。今得此可以傲日人矣。”广告文词竟如此具有民族自豪感实在可贵，比起有些地方视乡邦文献若草芥，置民族文化于不屑，真有天壤之别。

附录：《周无专鼎铭》附题记（在本期末页）

## 尚待考证的李善兰墓址

吴汉明

李善兰先生墓址，有两种说法：一说在海宁牵罾桥东北；一说在海盐县沈荡区天子堰桥之原。前者与李氏有关，后者与崔氏有关，由于年代较久，尚待考证。

据先父1951年春在“题李壬叔（善兰）先生遗像并序”中确切地记载：“壬叔先生葬海盐县沈荡区天子堰桥之原”（该桥现为海宁市狮岭乡与海盐县横港乡连接之桥，当时全属海盐县沈荡区）。这是比较可靠的资料记载。因为：

第一，先父生前与壬叔先生之弥甥崔李同素为知己。先生无子，以外甥崔敬昌为嗣。崔李同为崔敬昌之子，应该知道舅祖的墓址。况1933年崔李同还委托先父为《听雪轩诗存》代作跋。

第二,从天子堰桥与壬叔先生关系来分析。该桥距崔敬昌住地崔家场仅30—50米。崔李同也住在这里,当地人称其为“同少爷”。因先生世居硖石镇,故无墓地可葬,崔敬昌既为嗣子,葬天子堰桥完全有可能。

第三,从墓址的方位分析,1991年5月,海宁市人大、政协文史委及市志办的有关人员去天子堰桥实地考察。在地处海盐县横港乡的崔家场与海宁市狮岭乡的光耀村有一水之隔,天子堰桥是连接两地的古桥。在桥的东北有一古墓,墓碑早失。据崔李同的亲戚祝姓述及,70年代初期因平整土地,墓已被翻盗一空。墓穴系三和土矿穴,翻出来的尸体较魁梧,但墓底未翻动,故未发现墓志铭之类的金石文字。但从墓穴方位在桥之东北,恰好与另一种说法在牵罾桥东北的方位相吻合,也许是同一墓址,两种说法。

第四,从海宁的地名志上,只有天子堰桥而没有牵罾桥的地名。从同治元年(1862)出版的《顾氏宗谱》的有关墓园所称此桥名为添子堰桥,说明此桥名已沿用一百多年未变。

据《海宁同乡会讯》第14期署名王雪康的文章及中国科学院王渝生先生著文,均谓墓址在牵罾桥的东北。按此说法,笔者认为有两种可能性:一是依传统观念,先生应葬李氏祖墓,但先生既要崔敬昌为嗣,李氏族中何人操办其葬事?二是依牵罾桥这个特殊桥名,决不是民间随意叫出的墓址,只要查到此桥的确切方位和墓穴,就不难考证墓址所在。

为此,笔者建议有关文化部门寻访先生墓碑或墓志铭,或对天子堰桥之墓穴进一步深挖墓底,及采访李、崔两氏族中人,先生既为清代三品衔职官,葬时必有墓志铭和碑石之类留存。

## 记陈乃乾先生的两件事

虞坤林

陈乃乾,号东君。1896年9月生,1971年2月卒。是我国著名的版本目录学

家。他的祖先陈鳢是清代著名的藏书家，藏书楼名向山阁，驰誉江南。先生出身书贾，刻苦勤学，终于成为我国在版本学、目录学、索引学方面有突出成绩的学者，而这些成就的得来，跟先生所藏所读的大量书籍有关。

### 慷慨献书

陈乃乾一生没有离开过书籍，他藏书万卷，尤多善本，而正是这些书籍，帮助他解决了一个个学术上的难题。1956年8月，他因工作需要，奉命调到北京时，没有其他要求，只要求把他的书籍全部运往北京。上级部门考虑到他的工作需要，特准调拨车皮一节，将他的藏书全部带入北京。“文革”时期，正是这批书籍及这件事情，先生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而受到迫害，所幸的是这些书籍没有受到多大的损失。1969年林彪抛出1号文件，提出疏散人口。“军宣队”本拟要他到“五七”干校，因他年老体弱，同意他到浙江天台女儿家落户。面对跟随自己大半辈子的珍本书籍，先生毅然作出决定，全部捐献给中华书局。也正是这一壮举，在动乱时期无形中保存了这一大宗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

### 贫不移志

抗战时的1939年，先生居住上海“孤岛”南市。一天，他回到家里，就愤愤地自言自语：“反正弄不好了，穷总管穷了，汉奸的事情我不干。”家里人被他这句话弄得莫名其妙。在他妻子的追问下，才道出了原委：原来在上海的汉奸文人想借重先生的名望，诱以重金，要他在文艺界搞些汉奸文学，但这一阴谋立即遭到了先生的严正拒绝。陈乃乾回家后越想越气，所以道出了上面那番话。正如先生自己所说的那样，即使在那生活极度贫困的战争年代，也要始终保持一个爱国的中国文化人的名节。尽管他为生活所迫，需要靠写稿撰文为生，但他始终没有写过一篇对不起国人的卖国献媚文章，直到1943年进入开明书店时，才缓解了生活上的困境。

上海沦陷后，郑振铎先生在“孤岛”上努力为国家抢救、搜求古籍善本图书，海宁籍版本目录学家陈乃乾先生和赵万里先生等人也大力配合协助郑振铎先生做好这一工作，使一大批珍本书籍没有被敌人劫走，而通过蒋复璁先生，辗转秘密运送到内地，得以安然无恙。